

元代杭州的商业经济

● 李晓娟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广东广州 510632)

[关键词] 元朝;杭州;商业

[摘要] 元代杭州经济在南宋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在商业上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气势。由于蒙元统治者对商业的重视,杭州成为元代东南的大都会。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9-0061(2004)02-0160-02

一

元代,杭州为江浙行省的省会。自唐宋以来,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江浙地区日见繁荣。元代杭州作为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其商业的繁荣自然也是处于全国领先的位置。杭州原是南宋的行朝所在,本来就是当时屈指可数的商业大都会。南宋人描述杭州的繁荣为“车书混一,人物繁盛,风俗绳后,市井骈集”。入元后,杭州经济在南宋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气势。

蒙古入主中原后,重视商业的发展,提高了商人的地位,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观念上认为商人处于四民之末的思维定势。蒙古、色目的贵族往往参与商业活动,西域的商人阿合马、桑哥,汉人卢世荣以理财得宠于元世祖而身居高官。元末江南的文坛领袖杨维禎说出当时人的心态,“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们情愿舍官而做一获利丰厚的盐商。商人地位的提高,有利于元代杭州商业的继续发展。

杭州城内的市场活跃,秩序井然。马可·波罗对此有详细的记载,他提及杭州的市场时说“大型的市场有十所”,市场“周围建有高屋,屋之下层则为商店,售卖种种货物,其中亦有香料、首饰、珠宝”,在卖酒的店铺里,能不断酿制的米酒,更是物美价廉。沿街的小市场则更多。每星期有三日为集市,约有四、五万人来做买卖,人头攒动,十分热闹。市场的产品种类丰富,而且价格低廉。象自家在湖中养殖的鹅、鸭等家禽“其价甚贱,物擗齐亚城银钱一枚,可购鹅一对、鸭两对”。瓜果蔬菜是琳琅满目,不但有各色本地的品种,还有葡萄等从域外输入的水果。

杭州城内的行业有自己的行会组织。“此城有十二种职业,各业有一万二千户,每户至少有十人,

中有若干户多至二十人、四十人不等”。在这些行业的作坊中,有官办的、个体经营和私营的三种类型。元末来华的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对官营作坊进行了这样的记载,官办的作坊中,手工业者“皆是可汗的奴隶,都带者脚铐”从事繁重的劳作,“如年属五十岁,可免除服役,并供应生活费。”个体手工业者为了在竞争中得以生存,往往一户从事多种行业,“其家营利非一端,而打银其一也”。私营手工作坊发展迅速,出现了拥有生产工具和原料的大作坊主和出卖劳动力的手工作坊工人。在元末明初的学者徐一夔的《织工对》中,叙述了钱塘相安里纺织工场的情况。作坊主自备织机,雇工生产,工人领取计日工资,二者之间产生了雇佣关系,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经营方式。他还提到一位技术精湛的手工作坊工人,要求作坊主“加薪”,否则就“跳槽”,求“倍直者为之佣”,而作坊主为了留住人才,满足了他的要求。由此可见,当时私营手工业之间的竞争也是十分激烈。

作为人口逾百万的大都市,杭州是重要的消费市场 and 商品生产基地。就消费而言,以胡椒为例,每日杭州消费量为四十四担,达四、五千斤。可想而知,日常消费品如粮食、酒、肉、香料等的消费数量是何等之大。杭州作为传统的丝绸产地,除本地产出的生丝原料外,还要大量的从外地输入,以满足丝绸生产的需求。此外,杭州的谷麦加工业、制糖业、酿酒业、制瓷业等等也是十分兴盛。同时,杭州还是出口商品的吸纳地和钱塘江流域进出口商品的集散地。由于有着便捷的交通,杭州可以通过船舶把汇聚于此的进出口商品,由钱塘江通过澈浦港以入海。澈浦距离杭州 25 哩,是杭州湾的对外贸易港。这个港口“远涉诸番,近通福、广,商贾往来……冲要之地”,是元代

[作者简介] 李晓娟(1976—),女,江苏盱眙人,暨南大学古籍所,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元明清文化史。

优良的对外贸易港。在对外贸易中,杭州的进口产品主要是珍宝和香料,出口产品则为丝绸织物和瓷器、竹编制品等。

商业的发展带动了其他服务行业的繁荣。众多来往的商旅使餐饮、旅店业很红火。为了满足不同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人群,除了传统的南北口味,还有清真、素食饭馆,丰富了杭州人的饮食生活。这里的酒楼生意兴隆,成为亲朋好友聚会的最好场所。旅店为数不少,且每家都有十到十二个房间。娱乐业欣欣向荣。杂技、魔术、歌舞、游艇观光等活动花样繁多,让人留连忘返。高超的魔术技巧如此扣人心弦,曾使伊本·白图泰“大惊失色,心跳不止”,吃药才得以缓和紧张的情绪。信奉命运的杭州人,使算卦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行业。元代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说杭州人经营商业、出外旅行、缔结婚姻无不去占卜,“未经星者预卜,绝不举行婚姻”,可见,算卦业也顾客盈门。

二

元代杭州商业的发展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众多因素有机结合的结果。

政府曾经多次下令鼓励商业发展,禁止沿途官司刁难。政府下令,要求在商旅往来的要道及旅馆驻扎骑步兵,检查登记,确保旅客安全。伊本·白图泰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他评价说,“对商旅来说,中国地区是最美好最安全的地区。一个单身旅客,虽携带大量财物,行程九个月也尽可放心。”至元三十年(1293),杭州设立市舶司,后来杭州市舶司并入税务司。但并入后,它的职能并未消失,仍然有效的管理杭州的对外贸易。杭州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杭州为南宋行在,城内驻有几万名军队,军事安全不言而喻,同时它也维护治安,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保证商业活动的顺利进行。在杭州的各个市场里,都设置了官署,“乃副王任命之法官判断商人与本坊其他居民狱讼之所”。为了给客商提供方便,杭州在朝着市场的河岸上,建了石砌的仓库,来存储人们从印度和其他国家运来的货物,以方便交付市场出卖。而用石头建造,则可以在火灾多发的杭州,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交通的发达是商业经济发展的前提。杭州作为江浙行省的省会,海陆交通发达。元朝政府为了达到“通达边情,布宣号令”的目的,在全国修建驿站,在全国形成稠密的交通网络。至元二十八(1291)年,修建的大运河全线筑成后,钱塘江和我国的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几大水系相连接,为杭州和全国的物资交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江南水乡,河网密布,杭

州身受其利。在距离杭州二十五哩处的澉浦城,是元朝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位于钱塘江江口。满载进出口货物的船只从钱塘江驶往澉浦。马可·波罗描述到,“其地有船舶甚众,运载种种商货往来印度极其其他外国”。澉浦港有利的促进了杭州对外贸易的发展。

杭州的自然及人文环境吸引着来自全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商旅。杭州的城市规模大,规划合理,街道整洁宽广。她的景色怡人,美丽的西湖碧波荡漾,坐在游船上欣赏两岸的风景,可以放松忙碌的身心。马可波罗还注意到,杭州城的排污设施使城内的空气十分清洁,赞叹杭州的城市是“当时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市,良非伪语”。州商民待人和气,讲求职业道德。元人郑元祐在《遂昌杂录》中记载,杭州慧光庵的无著尼姑,误把金制香合当作银香合去打制耳环,工匠发现后,原物归还,显示了良好的职业风范。对待来华的客商,热情周到,平等交易。另外的一位意大利传教士鄂多立克说,“那整卷纸都写不下我所知的事。因为他是世上所有的最大和最高贵的城市,并且是最好的通商地。”南宋灭亡后,一些豪宗贵族之家多居杭州,奢侈品消耗大。杭州的繁华和富庶使她为“五方之民所居聚”地,外地的富商大贾为此纷纷来寻找商机,极大的促进着商业的繁荣。

由于元政府实行宽松的宗教政策,实行信仰自由,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为各地的客商消除了后顾之忧。在杭州,就有伊斯兰教的礼拜寺、基督教的教堂、佛教的寺院。杭州城中有一定数量的外国居民,有很多是善于经商的穆斯林商人。

杭州商业经济的繁荣,使她不仅成为元朝东南的大都会,而且是当时世界经济发达的城市之一。到了元朝末年,连遭大火以及元末明初的农民战争的破坏,城市破败,人口锐减,经济衰落下去。直到明中后期,城市的繁荣才逐渐得以恢复。

[参考文献]

- [1]耐得翁.都城纪胜[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 [2]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 [3]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 [4]郑元祐.遂昌杂录[M].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 [5]元典章[Z].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影印台湾故宫博物院元刊本,1998.
- [6]何高济译[M].鄂多立克东游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

[责任编辑:倪海清]